

文明竞争与国际体系变革

薛 力 李少康

摘要：“多种文明互相竞争，在竞争中合作、合作中竞争”成为文明间关系的主基调。随着文明竞争的发展，二战后由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正在经历深刻的变革，竞争与合作则成为国际体系中的主要互动规范。其中文明间的合作是主流，竞争与冲突是支流。中美作为两大文明的代表性国家，在相处中的差别表现为：中国强调文明间的交流互鉴与合作是文明间关系的主流，而美国则强调竞争与冲突是主流。

关键词：文明竞争 多极化 国际体系

中图分类号：D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7-2679 (2026) 02-0038-10

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领导世界的主观意愿与客观能力下降，新孤立主义在美国抬头。“反对全球化、强调美国利益优先、构建排他性小圈子以打压不受其待见的国家”成为美国外交的显著特色。与此同时，各个文明圈强化自身认同、抱团取暖，形成了全球化与本土化并行发展和双向互动的复杂态势。^①世界格局多极化的特征，逐渐从“大国间地缘政治博弈”转化为“文明间竞争”，世界因而进入了文明竞争时代（The Era of Civilization-based Competition），这是一个长周期。^②

一、文明竞争的背景

国际体系在特定历史阶段通常呈现出较为稳定的状态，但并非一成不变，在多重要素推动下，会发生调整与重构。世界进入文明竞争的长周期，主要指不同文化共同体之间关于认同和影响力的竞争成为国际体系的长期突出特征。与亨廷顿强调“文明间的冲突”不同，本文认为，亨廷顿从文明间关系的视角思考冷战后“关于世界政治的思维框架”^③具有洞见性，他的错误在于，将文明间的冲突当作文明间关

作者简介：薛力，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李少康，中共深圳市委党校福田分校助理研究员。

① 王文兵. 文化自觉与世界秩序变革 [J]. 湖南社会科学, 2017 (6): 33.

② 薛力. 新型礼治秩序：文明竞争长周期下中国外交长期方略 [EB/OL]. (2022-03-18)[2024-03-18].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7178972.

③ [美] 塞缪尔·亨廷顿.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M]. 周琪, 刘绯, 张立平, 等译.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9: 中文版序言 1.

系的主流。我们认为，人类社会能够存在与发展，主要原因在于绝大部分历史时期合作是主流，竞争与冲突是支流。冷战结束后，随着两大阵营之间对抗的消失，合作成为主流，竞争是支流，冲突则是局部现象，这也是冷战后全球化得以快速推进的主要原因。进入新世纪，虽然国家间的竞争在强化，各个文明体倾向于“对内强化自身的文化认同，对外强化文明间的竞争”，但文明间通过交流互鉴促进合作，是处理文明间关系的正确方式，也是绝大部分国家的选择。文明竞争的成因可以从客观、主观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客观因素

构成文明竞争的客观因素主要包括：文明身份的差异和物质力量的作用。

1. 文明身份的差异

文明是人类历史上具有客观实在性的社会共同体。尽管文明的地理疆界在全球化的冲击下逐渐趋于消解，但源自不同文明传统的价值取向与文化精神仍以弥散性样态持续作用于各类社会领域^①，至今仍然是界定人类社会深层结构的隐形边界。现代全球文明体系呈现出显著的多元共存特征，各文明实体内部都维系着持久稳定的结构或“实在”，这种实在由地理环境、社会形态、集体心理及经济基础等多重要素交织而成，共同界定了文明的基本形态与核心特质。^②文明的实体形态主要表现为大规模的社会文化共同体，其内在凝

聚力基于成员共有的生活方式与文化精神等，诸如中华文明、新教一天主教文明、印度教文明、伊斯兰教文明等。

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多元和合，道家和儒家是中华文明的主干，前者是一种半入世的宗教，其关注焦点在于人与自然的关系，追求天人合一，在齐家治国方面，追求顺势而为。相较于道家，儒家具备更鲜明的入世性，在中国历史上占据着主导地位。自汉以来，儒家文明经历了日益务实化的流变演进，注重在现存社会体系内履行世俗职责，包括家庭、宗族网络以及在帝国层面的责任。^③在对外关系上，中国古代王朝构建了天下礼治秩序，对于“华”“夷”采取不同的天下治理方略：对“华”（即“五服”中的甸服、侯服与绥服）采取的是直接统治，对于“夷”（也包括藩）则体现在纳贡、册封、和亲等政策，强调“礼不往教”“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并不寻求必须征服、同化，这是基本的历史事实。在传统的天下秩序中，中国被视作“天下”的中心，周边藩属国普遍将中华文明奉为圭臬，主动吸纳其教化规范。该体系对于政治领导权的理解，植根于儒家“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的垂范逻辑，以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思想之中，即在世界事务中的领导者不仅无权对他国发号施令，而且应该是一个遵守规则、负责任的、具有模范性的集体成员。总之，中华

① 赵轶峰. 文明与文明史 [J]. 中国史研究, 2022 (3): 38.

② [美] 彼得·卡赞斯坦, 主编. 世界政治中的文明: 多元多维的视角 [M]. 秦亚青, 魏玲, 刘伟华, 等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2: 1; [法] 费尔南·布罗代尔. 文明史纲 [M]. 肖昶, 冯棠, 张文英, 等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 48.

③ 薛力. “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正走向多元 [J]. 世界知识, 2019 (15): 73.

文明强调多元和合，而非二元对立。

相对于中华文明的“无外”“和而不同”，伊斯兰教、基督教等一神教文明则倾向于“他我二分”且高度对抗，并致力于将其“纯正的信仰”强加于其他集体。因此，一神教文明通常具有较为强烈的内在扩张动力，只要条件允许，就倾向于对外进行宗教扩张，这也是一神教分布区经常发生大规模宗教战争的主因。历史上，时长近200年的十字军东征是典型案例。15、16世纪，欧洲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地理大发现、科学革命、工业革命等多种因素的推动下，向全世界扩展影响力，在此过程中，通过“和平福音传播”与“军事暴力胁迫”两种途径，对非基督教文明体系实施压制、“改造”，乃至极端情况下的摧毁。到了20世纪，基督教文明遍布全球。

当代，美西方以“促进自由、民主”等名目干预他国内政，乃至谋求其他国家在价值观、政治制度、经济体制等方面向自己靠拢。

2. 物质力量的作用

20世纪40年代至50年代，美国的军事与经济力量在全球形成了压倒性的优势。军事方面，1944年，美国军用飞机产量为95,272架，舰艇产量375万吨，被称为反法西斯同盟国的“兵工厂”。二战

结束时，美国不仅拥有资本主义世界中最具优势的陆军，更建立了全球规模最为庞大的海空军力量，其军事网络遍布世界各地，掌控近500个海外军事基地，并垄断了核武器。^①经济方面，战后初期，美国总体掌握大约50%的世界财富。这充分展示了彼时美国在全球军事、经济中无可比拟的地位和影响力，也是其能够主导构建二战后国际秩序的原因。

美国的优势地位并没有长久得到保持。据不完全统计，自1945年二战结束至2001年间，全球范围内由美国发起的武装冲突约201场，占全球武装冲突总数约81%。越南、伊拉克以及阿富汗等一系列海外战争，不仅加剧了美国国内财政紧张的局面，也在国际层面上对美军的威望和声誉构成了显著冲击。^②经济上，根据世界银行数据，按现价美元计算，美国GDP占世界的比值已经由1960年的39.6%下降到了2024年的25.9%。^③此外，巨额债务负担也成为美国经济的一大隐忧。截至2025年5月，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逾36万亿美元。未来十年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将持续攀升，至2035年可能达到134%。^④

此外，非西方世界，尤其是新兴经济体的集体崛起，也是导致西方主导地位相对式微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一进程不仅体

①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 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第四卷 [M]. 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677，866，970；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 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第五卷 [M]. 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814.

② 张东冬. 美国国家实力衰落与国际权力格局的变化 [J]. 国际展望，2018（2）：38.

③ World Bank Group. Data 360: GDP (current US\$) United States 1960-2024 [EB/OL]. [2026-01-06]. https://data360.worldbank.org/en/indicator/WB_WDI_NY_GDP_MKTP_CD?view=trend&country=USA&average=WLD.

④ 新华社. 美国又失3A评级，白宫回应 [EB/OL]. (2025-05-18) [2026-01-05]. <https://www.peopleapp.com/column/30049096473-500006265092>.

现在经济实力的增长上，更表现为这些国家开始主动输出其治理范式与价值理念。例如，作为汇聚发展中国家与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合作新机制，金砖国家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地位日渐凸显，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超过 50%，远高于七国集团，呈现出显著的重要性。^①2023 年 8 月，随着金砖国家成员扩容，其 GDP 在全球经济总量中的占比由原先的 25.77% 提升至 28.99%。若以购买力平价作为衡量标准，2022 年金砖国家在世界经济总量中所占的比重已达 31.5%，这一比例已然超越了七国集团同期的 30.7%。^②美国实力的相对衰落，新兴国家在国际事务中愈加重要，二者共同重塑国际体系。

（二）主观因素

文明竞争的主观因素主要表现为：非西方文明自觉的凸显和新教—天主教文明领导世界的意愿明显弱化。

1. 非西方文明自觉的凸显

非西方文明的自觉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文明内缩的普遍化、对文明平等的寻求、新教—天主教文明普世主义价值观合法性的丧失。

第一，文明内缩成为普遍现象。冷战结束后，地区与国家层面的“文明内缩”（civilization inward）程度愈发显著，具

体表现为非西方世界对自身文化真实性的追求，以及全球范围内宗教多元主义的复苏。近年来，多个重要国家在政治文化与对外战略上呈现出明显的内顾倾向。土耳其与俄罗斯的案例体现了国内政治与宗教传统的回摆：前者在埃尔多安领导下持续弱化凯末尔世俗主义，扩展伊斯兰教在公共领域的存在；后者在普京执政期间系统提升东正教的国内外影响力，包括推动俄罗斯全球东正教共同体的构建等。与此同时，西方世界在战略与认同上也趋于内缩：美国在金融危机后全球参与度下降，伴随“特朗普主义”而兴起的新孤立主义外交取向进一步凸显；欧洲则在应对难民危机过程中，从相对开放逐步转向以安全与认同为导向的保守立场，并更积极地以“欧洲价值观”为工具，塑造其全球规范性角色。^③印度在莫迪执政后积极倡导印度教民族主义，呈现出向“印度教文明国家”转型的趋势，典型表现之一是在《公民身份法修正案（2019）》中公然对穆斯林群体进行歧视。^④凡此种种，展示出一幅文明内缩的全球画卷。

第二，对文明平等的寻求。地理大发现不仅是地理空间的向外扩展，更是一场深刻重构文明认知结构的历史进程。在海洋疆界不断延伸的过程中，欧洲将分布于

①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 金砖：全球发展的新未来 [R/OL]. (2022-06-21)[2024-06-21]. <http://rdcy.ruc.edu.cn/docs/2022-06/8067c3261edc4050b3f67a521526b3da.pdf>.

② 郑立颖. 数量增加超过一倍，金砖国家为何“历史性扩员”？ [EB/OL]. (2023-08-27). http://www.ce.cn/xwzx/gnsz/gdxw/202308/27/t20230827_38688792.shtml.

③ 薛力. 世界正进入文明竞合的长周期：亨廷顿错在哪儿？ [EB/OL]. (2022-01-12)[2026-01-06].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6237332.

④ 张恣煜. 印度正在成为“印度教国家”吗？ [EB/OL]. (2019-12-25)[2023-12-25].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5327250.

不同地理空间的人群差异，重构为历史演进序列上的先后差异，进而催生了文明等级观念，由此衍生出的地缘观念则植根于“文明优劣论”，西方国家的优势地位得以塑造。可见，当今国际社会的性质和形态深受权力关系与文明观念塑造的影响。

针对文明的不平等，个人、群体，以及作为文明体的国家，逐渐表现出文明的自觉与再审视。随着部分西方学者对西方文明深刻反思与批判，世界文明史的叙述范式逐渐出现从单一中心视角向多元互动视角的转变，其中斯宾格勒与汤因比等人的理论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20世纪以来，中国学术界也涌现出一批非西方视角的文明史研究学者，他们致力于将中国文明置于全球多元文明体系中加以考察。近年来，国内学界涌现出一批以中华文化为思想资源的国际政治关系理论，如道义现实主义、共生理论等具有代表性的理论范式。这些理论在构建中国自主的国际关系知识体系、突破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话语主导地位方面，作出了开创性贡献。俄罗斯同样展现出明确的文明认同转向，其重心从以往强调与欧洲的关联，逐渐移向凸显自身文化的独特性和自主性。

第三，新教一天主教文明普世价值观合法性的丧失。在反殖民化斗争、抗衡西方政治经济霸权、改革国际经济秩序的历史

进程中，后殖民时代的国际社会将批判与反抗进一步指向西方文化新帝国主义。这一转向深刻反映了后殖民世界对维护自身文化主权、构建独立、多元的文化身份的积极探索。当前，国际体系已不再呈现为单一、普适的模式，而是由蕴含不同文化理念与价值观的多元政治体系共同构成。^①正如斯宾格勒所言：“世界上存在着多元的文化形态，每一种文化作为一个有机体，拥有其独特的存在方式和内在逻辑，并遵循着特有的节奏和规律。”^②总之，一系列发展正在重塑国际社会的文明格局，扭转了长期以来由西方主导的文明不平等关系，标志着“文明的回归”，这一现象也被赫德利·布尔称为“对西方的反抗”。^③

2. 新教一天主教文明领导世界的意愿弱化

从文明竞争视角看，一个文明要取得全球领导地位，客观上须具备显著超越其他文明的综合影响力，主观上则须拥有运用并转化这一优势的明确意愿与能力。二战后的美国，正是凭借其压倒性的实力优势与主导世界的强烈意愿，有效联合新教一天主教文明圈的核心力量（主要是欧洲国家），并吸纳其他文明体系的部分成员，从而构建起二战后的国际秩序。^④

奥巴马主义主张在全球战略收缩，包

① 参见章前明. 中国视阈中的公正合理国际秩序[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8, 48(3): 92.

② [德] 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 西方的没落[M]. 吴琼, 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06: 导言 29, 16.

③ 钱乘旦. 文明的多样性与各国发展的不同道路[EB/OL]. (2019-11-08)[2023-11-08]. https://www.guancha.cn/Qianchengdan/2019_11_08_524447.shtml; PETITO F. Dialogue of civilizations in a multipolar world: toward a multicivilizational-multiplex world order[J].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2016, 18(1): 81-82.

④ 薛力. 文明竞争视角下，美国正从超级大国回归为普通大国[EB/OL]. (2022-11-18)[2026-01-06].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0773761.

括减少对国际组织的支持，减少全球的军事介入，以及把军事安全的重点向亚洲转移等。特朗普主义则强调美国本土与美国人的利益至上，并主张减少美国在国际安全领域的责任与义务。例如，退出《巴黎协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多个国际组织、放弃部分国际承诺，迫使盟友和伙伴国承担更多的安全责任等。美国主观上失去了为全球提供公共产品的意愿，已经难以充当领导者（leader），而是一个觅食者（forager），充其量是一个不太情愿的协调者（coordinator）。^①这也客观上给其他文明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空间。

二、国际体系的变革：一种文明竞争视角

国际体系是指国际中的主要行为体在相对稳定的结构中基于一定的规范进行互动所构成的整体。历史上出现的国际体系包括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维也纳体系、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以及雅尔塔体系等。国际体系主要包含三个要素：一是国际行为体（主要组成单元）；二是国际格局（单元能力的分布）；三是国际规范（体系中单元互动的方式）。从文明竞争的视角看，

国际体系整体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

（一）文明体成为国际体系的主要组成单元之一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通过法理形式确认了主权作为国家固有属性的理念，从而奠定了国家间主权平等的规范基础。

文明作为民族国家之上、全球社会之下的社会组织形式，具有超越民族或种族界限的特征。汤因比认为，好的历史研究单位既不应该是一个民族国家，也不是（在大小规模上处于另一端点的）人类整体，而是一个社会的人们的某个群体。^②鉴于文明在当下国际体系内反全球化思潮及运动中所产生的显著影响，赵轶峰认为，仅依靠国家史叙事和社会发展逻辑难以充分解释此类现象。^③威廉·W. 纽曼同样指出，坚持把民族国家作为分析单位，可能会阻碍我们理解当前的地缘政治趋势，非国家行为体和观念等代表着21世纪的元素。^④亨廷顿援引冷战后国际关系的现实案例，阐释了全球政治正进入一个多极且多文明的历史阶段。他主张，未来对国家最具意义的分类标准将不再是冷战时期的三大阵营，而是世界上的主要文明。^⑤以彼得·卡赞斯坦为代表的关于世界政治中的文明研究，集中讨论了6个文明复合

① 薛力. 文明竞争视角下，美国正从超级大国回归为普通大国 [EB/OL]. (2022-11-18)[2026-01-06].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0773761.

② [英] 阿诺德·汤因比. 历史研究：上卷 [M]. 郭小凌，王皖强，杜庭广，等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13.

③ 赵轶峰. 文明与文明史 [J]. 中国史研究，2022（3）：38.

④ NEWMANN W W. Hegemonic disruption: the asymmetric challenge to US leadership[J]. Strategic studies quarterly, 2011, 5(3): 94.

⑤ [美] 塞缪尔·亨廷顿.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M]. 周琪，刘绯，张立平，等译. 北京：新华出版社，2009：5-6.

体,为文明研究范式进一步提供了依据和支撑。^①费孝通将20世纪以及当今的世界格局比喻成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提出了新的“战国时代”论。他认为,20世纪的“战国时代”主要指世界列强的争雄,而当今“战国时代”阶段,除了政治、经济上的多元局面,更为重要的是多元文化之间的接触、交流和碰撞。^②杨光斌则认为,文明作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社会文化共同体,构成隐形的人类社会分野,并在塑造未来方面持续发挥着作用。^③

总之,随着文明在国际体系中的影响力日益凸显,当前国际体系的基本构成单元正经历一场深刻变化,逐渐从以民族国家为核心的一元结构演变为包含文明体等超国家行为体的多元复合结构。基于此,我们认为采用文明体的视角来剖析当代国际体系具有显著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

(二) 多种文明的竞争与合作成为主基调

亨廷顿强调全球化带来的不是一个相对同质化的文明世界。他从文明视角考察冷战后的国际政治,以及关于文明之间非同质化的观点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但与亨廷顿不同的是,本文并不赞成其将文明间冲突作为国际政治突出特征的判断。纵观人类文明史,不同文明之间的合作多于

冲突,各种文明继续共存、相互借鉴是不争的事实,如果文明群体之间始终以冲突乃至战争为主基调,则人类从野蛮到文明的发展很难发生,只有以合作与发展为主基调,才有可能实现不同文明的共存与发展。阿查亚也认为,文明间的交流并不都是通过征服发生的,历史上印度和东南亚的互动很大程度上以和平交流为标志,中国和印度文明近2,000年的互动记录绝大多数是和平的。^④文明共存与交融在非一神教地区是历史常态,罗素就注意到,佛教徒与儒家信徒的身份在中国往往并不冲突,二者可以在同一主体上实现兼容。^⑤

文明竞争与“文明冲突论”的核心差异主要体现在两个维度。一是对冲突的认知范式不同。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将不同文明间的冲突作为国际社会的基本面,认为文明断层线冲突是无休止的,普遍的;文明竞争理论则认为,文明互动的逻辑终点是文明互鉴,文明互鉴是文明竞争的转化形态与核心结果。在这一理论视阈下,冲突并非文明交往的终点或主导形态,而是文明间深度互动与融合的派生现象,在某种意义上,可理解为文明互动所需承担的成本,而非其主流或本质。二是竞争的行为逻辑不同。“文明冲突论”仍将传统联盟政治、阵营对抗视为异质文明

① [美]彼得·卡赞斯坦,主编.世界政治中的文明:多元多维的视角[M].秦亚青,魏玲,刘伟华,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44.

② 费孝通.美好社会与美美与共:费孝通对现时代的思考[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295-299.

③ 杨光斌.作为世界政治思维框架的文明范式——历史政治学视野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J].学海,2020(4):35-45.

④ ACHARYA A. Glob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R) and regional worlds: a new agenda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J].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2014, 58(4): 656.

⑤ [英]罗素.罗素论中西文化[M].杨发庭,译.北京:北京出版社,2009:85.

间角力的核心手段，延续了地缘对抗的零和思维；文明竞争理论则强调，在新的世界大战发生可能性很低的时代背景下，经济与社会发展已成为各文明体内部的核心议程，发展范式竞争——围绕现代化道路、治理模式的系统性博弈，已成为文明竞争的主要实现形式。

总之，当代世界多元现代性的演进，既非“历史的终结”，也不必然导向“文明的冲突”。^①文明竞争时代，国际体系中互动规范具有新的变化，其互动的方式及工具亦有别于主权国家时代，“多种文明互相竞争，在竞争中合作、合作中竞争”成为文明间关系的主基调。

三、文明竞争的影响

文明竞争对国际体系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次区域秩序的兴起与国际关系的文明多极化趋势。

（一）国际体系次区域秩序的兴起

尽管研究者们对于“构建什么样的文明区域秩序更有利于国际体系”的看法各不相同，但他们普遍认可次区域秩序的崛起以及普遍自由主义普世秩序的衰落。新崛起的文明大国对自身文明的认同感，促使这些国家致力于构建以自身为核心的文

明秩序，这对于未来的世界秩序，尤其是区域秩序具有重大的影响。在次区域体系中，由于共享一种外交语言、商业条约，以及某种秩序感，国际社会的力量将体现出较高的“文化一致性”^②。这些力量持续地塑造着国家、区域，乃至全球的政治格局，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代表了一种新型的文明政治形态。^③

学术界对于“何种文明区域秩序更有利于国际体系”至今没有定论。我们坚信，在多文明竞争时代，区域与次区域秩序的兴起已成为一种显著趋势，传统意义上统一而普适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正经历着历史性的大变化。

（二）国际关系趋向文明多极化

为区别于西方以均势论为核心的多极化思想及其历史实践，有必要对当今文明多极化进行重构。

首先，相对于单极格局，文明多极化有利于国际关系民主化。例如，随着非西方大国的崛起以及新兴国家积极倡导自身的文化价值与地区性国际秩序，一个去中心化或者说多中心化的国际体系正在形成，这有助于消解霸权主义。国际自由主义已不足以涵盖新兴世界秩序的全部规范范围，中国化或印度化的多重进程也必将进一步推动世界秩序的重新定义。^④例

① [以] S. N. 艾森斯塔特. 反思现代性 [M]. 旷新年, 王爱松,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6: 19-20.

② BUZAN B. Culture and international society[J]. International affairs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44-), 2010, 86(1): 22-23.

③ PETITO F. Dialogue of civilizations in a multipolar world: toward a multicivilizational-multiplex world order[J].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2016, 18(1): 81.

④ KATZENSTEIN P J. Sinicization and the rise of China: civilizational processes beyond east and west[M]. New York: Routledge, 2012: 14.

如,以中华文明为代表的世界秩序观强调反对霸权、追求平等有序、开放包容的多极化格局,显然有助于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其次,更为重要的是,相较于具有“刚性”特征的主权国家,文明作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为宏大的柔性社会文化共同体,其分野并不取决于由政权体制划定的刚性边界,而更多体现在生活方式、精神追求与制度形态等柔性差异之中。^①文明多极化的形成,将赋予多极化更多的价值性,打破西方中心主义为基础的多极化理念。

文明竞争时代的国际格局的主流是文明间的交流与合作,但这并不意味着文明间的关系都是温情脉脉的。一些秉持对抗性思维基因的文明体,很难接受实力、影响力被其他国家与文明体超越的趋势,为此而采取种种措施,以打压、霸凌新兴国家的崛起进程。典型如特朗普第一任期以来美国对中国采取的经济上“规锁”、科技与人文交流上限制、政治与外交上打压等措施。对此,中国政府清醒意识到在合作的同时,“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必要性。针对特朗普政府2025年4月11日威胁对华施加的145%的超高关税,中方一方面回报以125%的关税,一方面掌握节奏,秉持着“打,奉陪到底;谈,敞开

大门”的原则^②,与美国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反而2025年5月就在日内瓦与美国达成关税调整核心框架^③。

总之,在文明多极化时代,等级森严且不平等的国际关系将趋于结束,文明多极化的国际秩序趋向凸显。正如法比奥·佩蒂托所说,一个拥有新的文明政治、多重现代性的多极世界的出现,以及不同文明间的对话与区域主义之间的联系或将是未来构建全球和平的关键。^④

四、结论

本文尝试从文明间竞争的视角分析国际体系的演化与特征,旨在为理解当代国际秩序的转型提供一种补充性的分析路径,或有助于深化对这一议题的认知。

亨廷顿从文明间关系视角思考冷战后“关于世界政治的思维框架”^⑤,是一个重要的学术贡献,拓展了学者们观察世界政治的视角。他的错误在于,将文明间的冲突当作文明间关系的主流。人类是群居动物,人类社会能够存在与发展到今天,主要原因在于,包括文明体在内的不同族群之间,其关系的主流是合作,竞争与冲突是支流。冷战后全球化快速发展,原因就是文明间合作再次成为文明间关系的

① 赵轶峰.文明与文明史[J].中国史研究,2022(3):37.

② 谢希瑶,王雨萧.商务部:谈,大门敞开;打,奉陪到底[EB/OL].(2025-04-10)[2025-07-24].<https://www.xinhuanet.com/fortune/20250410/3f1398d36574428fb19f7dac5be79ade/c.html>.

③ 谢希瑶,郑博非.李成钢:中美就落实两国元首通话共识及日内瓦会谈共识达成框架[EB/OL].(2025-06-11)[2025-07-24].<https://www.news.cn/world/20250611/44a2771d8f484816a9229987deb82784/c.html>.

④ PETITO F. Dialogue of civilizations in a multipolar world: toward a multicivilizational-multiplex world order[J].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2016, 18(1): 78-91.

⑤ [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周琪,刘绯,张立平,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9:中文版序言1.

主流，竞争是支流，冲突乃至战争都属于局部现象。

当今国际体系呈现出以文明竞争为主要特征的多极化，世界进入了文明竞争的长周期。文明竞争时代，没有一种文明有主观意愿与客观能力主导世界，“多种文明互相竞争，在竞争中合作、合作中竞争”成为文明间关系的主基调。

文明竞争的深化正推动国际体系发生结构性演变，其组成单元、国际格局与互动规范均呈现显著变化。首先，文化因素作用上升促使当前国际体系单元从单一民族国家向多元非国家行为体扩展，这些行为体主要依托文化或文明认同而非传统政经范畴。其次，由于全球文明体的分层，未来的国际体系将呈现一种“多极多层”的文明格局。在这一格局中，各国将围绕其所属文明的核心国家界定身份与行为，使国际关系呈现多中心、圈层化的特征。最后，随着竞争主体向文明体转变，和平竞争有望成为主导文明间互动的基本规范和行为准则。

此外，文明竞争还可能推动国际社会

中次区域秩序的形成，并助推国际关系趋向文明多极化。首先，随着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及其文明认同的强化，这些国家将致力于构建以自身文明为中心的区域秩序。其次，文明作为一种兼具历史纵深和柔性的社会文化共同体，其多极化本身既承载着多元价值，也将从结构上对国际关系产生积极作用。

总之，在一个多元多维的世界中，应坚定不移地推进文明多极化进程。此外，多样性制度能否满足不同文明体表达诉求并获得与其实力相适应的权利，也是地区和全球稳定有序治理的关键。中华文明包容性比较强，这是欧美学者也承认的基本事实。^①在推进中华文明复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中国有必要也有能力发挥自己的文化特长，在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过程中，积极融合传统中华哲学理念与现行国际秩序的核心特征，构建以自身文明为核心的区域“新礼治秩序”。

（责任编辑：曾 加）

^① 笔者注：2018年夏天，笔者在伦敦对英国学派代表人物巴里·布赞教授进行学术访谈，他也明确表示，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强于基督教文明。

Civilizational Competition and Changes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XUE Li, LI Shaokang

“Multiple civilizations compete with one another, cooperating amid competition and competing amid cooperation” has become the dominant theme of inter-civilizational relation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ivilizational competition, the post-WWII international system led by the West is undergoing profound changes, in which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have become the primary norms of interaction. Cooperation between civilizations represents the mainstream, while competition and conflict remain secondary. As representative states of two major civilizations, China and the U.S. differ in their approaches: China emphasizes that exchanges, mutual learning, and cooperation constitute the mainstream of inter-civilizational relations, whereas the U.S. asserts that competition and conflict do.

The Dissemination and Study of *Sun Tzu's Art of War* in the Spanish-speaking World

MI Tian

Sun Tzu's Art of War entered the public view of the Spanish-speaking world in the 1940s. After its complete translation into Spanish in the 1970s, a multi-modal and cross-media dissemination pattern gradually took shape, centered on translation and introduction. Meanwhile, research on the work has progressively expanded in scope, showing a pragmatic, statecraft-oriented tendency and a characteristic 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The dissemination and study of *Sun Tzu's Art of War* have constructed the discursive system and knowledge genealogy of Sun Tzu studies in the Spanish-speaking world.

The Long March Changed China

JIANG Jiannong, HOU Angyu

The year 2026 marks the 90th anniversary of the victory of the Long March. In March, the editorial office of *Studies on Sun Tzu's Art of War* invited Researcher JIANG Jiannong, former Director of the First Research Department of the Party History Research Center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to deliver a lecture entitled “The Long March Changed China.” From a broad historical and strategic perspective, Researcher JIANG elucidated the concept of the Long March, the keys to its victory, and its far-reaching significance, thereby deepening the understanding of this pivotal episode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An Exploration of the U.S. Military's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of *Sun Tzu's Art of War*

LIU Peng, DONG Huinan

The U.S. military emphasizes studying and applying *Sun Tzu's Art of War* in its theory innovation and warfighting practices. Historically, the failure in the Vietnam War drove the U.S. military to seek winning strategies from this classic. In the present context of great-power competition, it aims to gain an advantage over rivals through “knowing the enemy.” The U.S. military's engagement with *Sun Tzu's Art of War* spans the entire spectrum from theory to practice. However, its approach is marked by persistent and inherent shortcomings: a distorted view of warfare, methodological deficiencies, and cognitive biases rooted in its strategic culture—all of which run directly counter to Sun Tzu's philosophy of “prudent warfare.”

Russian Scholarship on Ho Chi Minh's Studies of *Sun Tzu's Art of War*: Centered on Kolotov Vladimir N.

GUO Laimei

Russia has a long history of translating and introducing *Sun Tzu's Art of War*. Contemporary Russian scholar Kolotov Vladimir N. not only completed the first Russian translation of Ho Chi Minh's Vietnamese *Sun Tzu's Art of War* but also conducted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application of its strategic thinking in the August Revolution of Vietnam and the two Indochina Wars. Reviewing Kolotov's translation and research on Ho Chi Minh's *Sun Tzu's Art of War*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racking the developments in Russian Sun Tzu studies and for enriching the content of overseas research on Chinese military classics.

Review of *Clausewitz: His Life and Work*

YANG Hu

Published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 2014, *Clausewitz: His Life and Work* is a masterpiece. This book enables us to gain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Clausewitz's era, life experiences, and ideological insights.